

## 近代男性知識分子的性別論述與矛盾： 以梁啟超五四前後的婦女與女權思想為例

李曉蓉<sup>1</sup> 黃文樹<sup>2</sup>

### 摘要

近代男性知識份子提倡婦女與女權論述，是近代中國不容忽視的重大變革。眾多研究著眼於做為政治、文化與思想領航者的梁啟超關注戒纏足、興女學等婦女議題，然其論述間的矛盾處，惜少見討論。本研究應用論述分析，分析梁啟超婦女與女權之思想啟蒙、演變與影響，嘗試探究其論述之矛盾處。本文提出梁啟超論述之矛盾處有三：婦女論述是「女權論」或「女論」，婦女應是「西婦」或「賢妻良母」以及男性是女權「提倡者」或「壓迫者」。此研究也期盼為近代性別論述與研究，提供更豐富風貌。

**關鍵詞：**女權、性別／婦女論社、知識分子、梁啟超

---

<sup>1</sup>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sup>2</sup> 樹德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特聘教授

通訊作者：李曉蓉，E-mail: hjeveli@yahoo.com.tw

收稿日期：2020/09/01；接受刊登日期：2021/06/29

DOI:10.6284/NPUSTHSSR.202109\_15(3).4

## 壹、前言

李又寧（1980: 1）於《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導言寫道：「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革的巨大，是史無前例的，婦女的改造尤其顯著，幅員也最廣闊。」她認為婦女改造與演進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朵奇葩」，「如果婦女沒有與時俱進，那能有近代化」。職是，婦女問題、思想、地位、權利等演變也代表近代中國歷史的進程。分析晚清至五四女權發展，「就中國近代而言，重視女性權利是一個被肯定的事實」（李曉蓉，2012: 45），但值得注意，譴責束縛女性的思想並非始於五四時期，明清社會已出現譴責禮教、習俗約束婦女精神與身體之聲音（李國彤，1995）。以清代李汝珍為例，胡適（1986a: 99）說：「李汝珍所見的是幾千年忽略了婦女問題。他是中國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著作的《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李又寧（1981: 188）闡釋婦女問題的揭露是：

部份地反映了社會的矛盾和傳統的開始動搖，預示了變革的臨近。也可以說，在傳統社會的母體裏，早已孕育著改良婦女地位的意識和胚胎。

這些本土思想也為近代婦女解放，立下思想基礎的準備（李曉蓉，2012）。可惜的是，關懷婦女主張或以個人論述或寄身於文學中，畢竟個別或少數關懷難以改變根深柢固的父權意識型態與制度，甚至被視為是離經叛道異端。在安慶演講時，胡適（1922: 6）清楚描繪婦女受禮教壓迫與沒有自我的情形：

我們都以為她是父親的女兒，以為她是丈夫的老婆，以為她是兒子的母親；所以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話，從來總不認她是一個人！在歷史上，只有孝女，賢妻，烈女，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

胡適（1986b: 239-240）譴責：「聖賢經傳，全沒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學大儒，天天談仁說義，却不曾見到他們的母妻姊妹受的慘無人道的痛苦。」他用「把女人當牛馬」、「全世界的人類裏，尋不出第二國有這樣的野蠻制度」（同上）、「我們這個國家是最野蠻的國家」（1986c: 243），沉痛形容自己國家的婦女遭受不人道、不平等的對待。

就政治與社會背景，清末朝廷積弱不振與接連敗役，1860 年英法聯軍入北京，1894 年與日本交戰海陸軍皆敗，激起維新運動波瀾。謀求改善國家沉痾之際，知識分子見到西方國家富強及受西學影響，「尋求解決國家與個人的困境時，一方面動搖了對於中國傳統禮教的信心，另方面則日益堅信西方的自由和法治的價值」（楊貞德，2004: 45）。激進維新人士主張或反思兩千年的學是「荀學」，是鄉愿，政體必須改革，名教綱常也該全變（余英時，1991）。與此同時，西方天賦人權、博愛以及男女平等觀念相繼傳到中國，知識人士倡議西方思想和制度，如個性解放、人權法治（杜維明，1989）。受西方視女性為評斷國家文化良窳之影響，國內被忽略與壓迫的婦女開始成為知識分子關注焦點，誠如梁啟超（1978a: 41）指出：「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約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他進而強調三個難題解決關鍵，在於「居其半」的婦女。此外，知識分子揭橥現代化國家的女性地位與國家地位是息息相關，婦女解放是人權，也是現代化的關注焦點（Wang, 1999）。1927 年刊登於《新女性》翻譯自 Louis Buchner 所寫《世紀之曙光》的《女權論》，文中闡明：「無論在任何民族與任何時代中，皆隨著文明的程度而轉移，愈文明的地方或時代，婦女的地位愈高」（劉人鵬，1999: 31）。「一時間『女子地位』不僅成為中外文化傳統差異的標誌，而且成為中國的過去與中國的未來的分野，性別觀念因此幾致成為文明進化的象徵」（胡纓，2001: 6）。婦女地位被納入考察國族現代化的重要線索，重視婦女資源風潮，方興未艾。晚清至五四攸關婦女問題、權利與重要性的種種論述，也是在此建構「新中國」與「新女性」的時代背景與思潮中進行。

雖有先進女性參與革命行動、辦學和提倡女權活動，「女權的倡導者與主導者仍以男性知識分子居多」（李曉蓉，2012: 52），這與當代社會脈絡有著密切關係。對於梁啟超，胡適（1986d: 111）稱頌：「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本研究選擇做為政治變革參與者、西方文化引介者以及思想領航者的梁啟超，嘗試分析其婦女與女權論述<sup>1</sup>，原因有三：其一，如上述，梁啟超思想備受推崇，深具影響力。其二，梁啟超婦女

<sup>1</sup> 1900 年年 5 月 11 日《清議報》刊登署名石川半山〈論女權之漸盛〉譯文，基於須藤瑞代（2005: 140）論點，此文提到「女權」，「在此之前，梁啟超也沒有使用過『女權』。」喬以鋼、劉堃（2008）指出，自 1902 年起「女權」成為婦女解放的口號。因而，本文應用婦女與女權論述來表述梁啟超五四前後之婦女思想。

與女權論述有其歷史淵承與獨創性，不僅反映梁啟超自己與該時代特有的價值取向，也勾勒出政治與社會變遷脈絡。其三，梁啟超對於近代女權思想與進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日本學者稱他是清末婦女運動三大主要流派代表之一（鮑家麟，1981）。因此，本文主旨在於藉由整理與分析梁啟超婦女與女權之思想啟蒙、觀點演變與影響，試圖透過資料爬梳，檢視其婦女與女權論述，以探究與析論梁啟超婦女與女權論述的矛盾處。學者主張梁啟超婦女論述是在追求國家現代化脈絡中，呼籲重視婦女權益／利與重要性。梁啟超憧憬與建構的婦女形象，是能革命獨立的西方女性或是善種強國的賢妻良母。男性提倡與主導女權，卻參雜維護父權壓迫者的心態（丁琪，2011；宋少鵬，2010；肖莉丹，2013；李曉蓉，2012；劉人鵬，1999）。如本文以下分析與詮釋，梁啟超的婦女論述流露是「女權論」或「女性論」、理想婦女是「西婦」或「賢妻良母」、男性知識分子是女權「提倡者」或「壓迫者」之矛盾性質。黃嫣梨（2004: 90）指出梁啟超觀念是「固是時勢使然自非梁啟超所獨有，而且是當時維新派常出現的通病」。或進一步說，本文內容反映梁啟超個人與當代女權思想之時代意義，也期盼為近代性別論述與研究提供更豐富風貌。

##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應用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為研究方法，旨於探究梁啟超的婦女與女權思想形成、論點與變革歷程，析論其矛盾之處。Robson（2002）指出，特殊情境脈絡會產生特定類型的文件。根據游美惠（2000: 32）<sup>2</sup>的觀點，論述分析「不僅檢視文本本身，而是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及其相關社會場址（institutional sites）和歷史文化因素都納入分析中」。要瞭解、分析以及詮釋梁啟超的婦女論述與思想以及其矛盾處，本研究蒐羅歷史書寫文件／文本（written document/texts），一手史料包括梁啟超撰寫文章、專書、報紙與文集，特別是論及婦女、女權、婦女解放相關著作。除了梁啟超之著作，本研究也援引學者們研究梁啟超的論述與著作，以及為梁啟超撰寫傳記或評論相關文章，以為參酌。這些研究梁啟超的著作提供或深入的、或迥異的視角，審視或批評梁啟超的思想與重要性。

---

<sup>2</sup>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文本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與論述分析三種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功能與解析觀點，相關之討論可參見游美惠（2000）。

Skinner (2002) 主張概念在歷史轉型時期可被重新定義或突然發生轉換，然概念之興起與消失並非偶發的，且具有推動歷史發展功能，所以考察某些概念在何時佔有重要地位與產生何種力量，對於瞭解社會的變遷深具意義。如上述，論述分析重視文本內容以及文本產生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因為文本是存在或形成於某個情境脈絡中，因而不應只單獨檢視或解讀文本，也應該瞭解文本在何種環境中形成、建構意義為何，甚至產生哪些影響（游美惠，2000）。對於文本史料的詮釋，Robson (2002) 也強調必須重視並且釐清其產生的社會脈絡。因文本／件可能涵蓋脈絡情境中制度、社會、文化的觀點，提供更寬廣與整體性的觀點（Hesse-biber and Leavy, 2006）。探究梁啟超的婦女論述與變革，必須將其置於近代思潮變革歷史脈絡中，因此本文也蒐集述及當代女權之相關研究與文件，這些研究文本／件內容中不僅呈現論者們對婦女問題、權利或解放的主張或批評，也述及或反映當時家庭、社會及文化的情境脈絡，或書寫者對環境的評述。簡言之，本文嘗試藉由多元文本的爬梳，相互印證與詮釋梁啟超與近代女權論之風貌。

## 參、梁啟超的婦女思想與其變革

根據黃嫣梨（2004）分析，梁啟超於戊戌變法時期提出禁纏足與興女學，戊戌變法失敗後，發表禁早婚與倡女權。因此探究梁啟超婦女與女權論述，必須檢視晚清以降社會、政治與思潮的變革脈絡，可瞭解他是在何種歷史背景產生攸關婦女問題、權利與思想遞嬗。此部分以梁啟超婦女思想的形成源起、清末婦女論述與其五四時期女權思想之變革，分述如後：

### 一、梁啟超婦女思想之形成源起

梁啟超 1896 年撰寫〈變法通議——論女學〉，清楚勾勒出婦女地位、智識程度低落與國家的國貧民弱息息相關。1897 年梁啟超（1978b: 20）於〈創設女學堂啟〉寫道：「甲午受創，漸知興學」，可知他強國救種的想法是在甲午戰敗之後形成（Huang, 1972）。值得注意，梁啟超與康有為等人雖然積極主張維新變法，1898 年戊戌變法之前他們並無出國遊歷的機會或經歷，因此梁啟超述及西方、日本辦女學、婦女解放等主張，是受到《萬國公報》的啟發（程郁，2005）。由上可知，因知識份子必須正視國家存亡的危機意識與採取更積極變革的使命

感，謀求改善國家沉痾之際，又受到他國富強與翻譯西學思潮之影響，體認婦女重要性，啟發梁啟超此階段之婦女思想。

## 二、梁啟超清末婦女議題之主張

晚清男性知識分子謀求富國強兵與現代化之時，逐漸將目光投向婦女，因「使中國之婦女自強」就是「為國政至深之根本」（嚴復，1898）。黃嫣梨（2004）提出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更重視女學，進而關注婦女就業與女權問題。以下由婦女經濟生產、戒纏足與興女學、關懷婦女行動和受西學影響數個層面，亦可窺知梁啟超清末重視婦女之主張。

婦女問題提出之初，男性知識分子關注的是婦女經濟地位。梁啟超早期女權思想偏於經濟取向（鮑家麟，1999），主要受到《萬國公報》刊登翻譯英國傳教士 R. Timothy 分利經濟思想文章之影響（劉慧英，2009）。攸關分利與生利觀點，也被用於論說不纏足與興女學（夏曉虹，1995）。婦女經濟能力之於國家存亡，1897 年梁啟超（1978a: 38）先在〈論女學〉指出：「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國內情形是「一人須養數人」，二萬萬女子「不官、不士、不農、不公、不商、不兵」，「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以及「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造成男女都極苦情形（同上）。而「生計界競爭，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問題也，各國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國之所以爭自存者亦當在此」（同上，1999a: 687）。至 1902 年他撰寫〈新民說——論生利分利〉論點有所改變，將家務歸為生利部分，未改變的是婦女中生利者少於分利者（劉慧英，2009）。無疑地，「婦人無業」靠男子的供養，沉重負擔是國家積弱不振之根源。梁啟超認為讓婦女有知識有能力從事職業，從「分利」變成「生利」，家與國因之富強。

女子纏足風俗，社會形成輕視女性的情色、性別刻板文化（Ko, 2001）。早於 1897 年梁啟超已撰寫〈戒纏足會敘〉，1898 年梁啟超與經元善等人倡議和籌辦經正女學（中國女學堂），就是由梁啟超的「不纏足會」發起。梁啟超（1978c: 120）相信纏足殘害身體，讓婦女淪為「充服役」與「供好玩」的地位，也抨擊「中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同上：121）。況且「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同上，1978a: 44），導致國家衰弱，為富民強國就要戒除纏足陋習。倡議戒纏足解除女性身體桎梏，此時期梁啟超的婦女思想也力主興女學，主張有五利。其一，婦女「極苦」因「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同上：38）。女子不纏足，受教育，能改變女性低落的家庭和社會

地位。其二，梁啟超主張「學」是能「內之以擴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同上：39），分擔男性「不足以贍養其妻孥」重擔（同上：38）。女性受教育學習實用知識與具備生產能力，有助改變國貧弱家。呼應分利觀點，女學以實學、務實致用為宗旨。其三，女子受教育，會注重體育，可達到強健自己之目的。其四，重視優生強國，梁啟超（同上：40-41）強調正人心與廣人才是治天下之大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藉此抨擊不識字、不讀書婦女無法盡到母教責任。反之，婦女受教育，注重自己身體健康之外，能生育並教育強健下一代。其五，梁啟超（1978b: 19）在〈倡設女學堂啟〉開宗明義指出，興女學使婦女「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論女學〉中他更直言不諱：「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女不學始」（1978a: 38）。他藉此深切批評「婦人無才即是德」觀念，就是「讐言」。因為「不識一字，不讀一書」婦女或者是「批風抹月，拈花弄草」才女，「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同上：39），指出養成「深居圍閣，足不出戶」、「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婦女是謬誤觀念（同上：44）。「欲強國必由女學」（同上：43），同時勾畫出晚清有志之士體認婦女智識低落與國家國貧民弱密不可分，因而汲汲鼓吹女子教育為救國之根本。潘毅（1997）評論清末不纏足與興女學運動，可謂是近代解放婦女的先聲。不容忽視，維新份子們倡導不纏足與興女教充斥著政治與國族主義鮮明的色彩。

梁啟超關注婦女身心有言論，也付諸實際行動。梁啟超與黃遵憲、汪康年於1896年8月在上海創國人自辦報刊《時務報》，此報對當時維新派影響甚大。梁啟超是該報早期主編，其間發表《變法通議》、《西政叢書》等五十多篇文章。1897年梁啟超創辦上海不纏足會，梁啟超於4、5月撰寫〈論女學〉一文，倡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之後落實理論創辦經正女學，是國人自辦第一所女學堂。不纏足會掀起全國響應，女子學校對國內女教起了振聾發聵、開啟民智之作用，以及國人自辦女校與教會女校並進之勢。先覺婦女們的覺醒與成長，「借助的正是對民族國家充滿現代性想像的男性的勢力和資源」（丁琪，2011: 157）。梁啟超支持創辦中國女學會與該會發行第一份婦女報紙（女學報）之外，梁啟超鼓勵妻子李蕙仙放足，兒女教育展現平權做法，讓女兒都受高等教育，甚至出洋留學。

深受西學的影響，梁啟超經由《清議報》、《新民叢報》向國人介紹天賦人權等思想，主張個體是有主權和自由的觀念（周昌龍，1995）。梁啟超（1978d: 19）論說：「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婦女方面，

梁啟超是維新分子中接受西化較深者，在文章枚舉西方國家、日本的婦女地位與情形，對照出國內女性的知識淺薄與地位低落，致使國族陷於衰弱不振危機中（許慧琦，1997）。梁啟超（1978b: 20）說：「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護，日本以強；興國智民，靡不始於此。……採泰西之美制，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因「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1978a: 41），「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同上：43），可知他以外國情形為借鏡，呼籲重視婦女與興女學是維繫國族存亡之關鍵。

戊戌維新醞釀時期梁啟超撰寫〈記江西康女士〉（也見下文），此文中可以窺見學習西方知識與受現代教育、從事職業、貢獻自我、融合中西優點之新式婦女典範與塑造，這樣婦女形象也貫穿梁啟超清末至民初婦女的主要論述。女子教育做為重視婦女一部分，與戒纏足、生利本是息息相關。為了國家現代化和西學影響，梁啟超抨擊無知無能裹小腳的傳統婦女，更極力鼓吹女子要放纏足、重視身體強健、受教育、就業生利，成為貢獻國家人民的新式婦女，展現婦女地位與權利變化的曙光，也伴隨著性別角色與關係必須重新定義之意涵。

### 三、梁啟超五四時期女權思想之變革

梁啟超曾如此描述自己：「以吾數年來之思想，也不知變換流轉幾許次」、「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游輝榮，2005: 2）。民元後，婦女問題再度引起社會各界重視，知識分子更積極外求新概念，以推翻舊傳統之桎梏，女權思想與理論經由報章雜誌大量翻譯與引介入中國，風氣所及，五四時期強烈詆斥傳統禮教及封建社會對婦女之荼毒。國內出現眾多譯介西方女權思想的文章，也對梁啟超的女權觀起了影響（鄭永福、李道永，2011）。吸收與綜合西方經驗與觀點，由梁啟超主張女權即人權的論述，具體展現其女權思想之轉變。

此階段梁啟超的女權論述，由他在 1922 年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演講〈人權與女權〉可得知。演講中他闡述自己的女權思想，提出女權運動就是「廣義的人權運動」（1978e: 83）。梁啟超（同上：86）聲言要改變國內「微微不振」的女權運動，「第一件就要看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如何」，這也是「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所在。他深入闡析：

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同上）



因「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的情形，講女權「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同上）。不僅不依賴，女性也要自覺自動，否則「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同上）。強調不依賴男子與女性自覺，以求取男女平權的重要性。

女權實現需要女性具備深切自我意識，也需要循序漸進。梁啟超（同上：84）提出：「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女權實現也分為三個階段，包括教育、經濟、政治三層面與階段是「廣義」的女權運動。他進而強調：

女權運動，無論為求學運動為競業運動為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為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同上：86）

他勉勵女性「都要多培實力，少做空譚」，要「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以「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同上：86）。事實上，同年稍早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演中，梁啟超（1978f）已提出史學、會計學、圖書館管理學與新聞學四種學科，認為這些學科和女性「特長」相符合。女性若能以這些學科來發展優勢，將來與男性競爭這些職業，必可獲得優勝地位。

隨著時空流變，梁啟超女權論述有所改變。之前他倡議婦女要改變落後依賴習性，分擔男性責任，清楚設定婦女救國強族之角色與使命。五四時期女性解放時代氛圍中，除了在女權與人權畫上等號，他轉而強調女權包括婦女自覺自動獨立，追求教育、職業與政治平等，鼓勵以性別區隔不同的學習學科與未來就業。這項轉變的重要性，彰顯女性被賦與進入公領域與男性競爭的資格與能力，條件是新女性先有主動意識的覺醒與行動。另一方面，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兩性生理是有差異的。考量「特長」前提下，女性在與生理有關領域才有發展與就業優勢，其他職業難以進入或無法男性競爭是合理且正當的。顯然可見，其女權話語中依舊夾雜著對女性的性別偏見與貶抑。

## 肆、梁啟超婦女論述之矛盾處

宋少鵬（2010）認為近代中國女權的發展與演變，不能簡化為是婦女或為婦女爭取權利的問題，而是攸關國族與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就女權發展，梁啟超無疑扮演先驅之角色，然而在近代國家建造（state building）脈絡、女權

興起的動因與思潮變遷之間，透過資料梳理、分析與闡釋，也有矛盾之處貫穿梁啟超五四前後婦女與女權論述之間，值得析論。本文提出矛盾處，分述如下。

## 一、婦女論述是「女權論」或「女性論」？

根據李又寧（1981）研究，戊戌之前無人提出女權的觀念與用詞，因為「權利」是移植西方的觀念，大約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傳至中國，才有這個新詞彙。然而，它代表原本意義與觀念並未受重視，遑論形成思想上的力量或做為某種政治或社會運動理論基礎。梁啟超（1999b: 674）亦不諱言：「吾中國人數千年來不識權利之為何狀」，實因「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為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同上：673）。就女權而言，翻譯〈女權篇〉、〈女權說〉的馬君武與撰寫國內最早有系統闡述女權革命著作《女界鐘》的金天翮開始用女權一詞，以天賦女權為立論基礎，也促進國內知識分子使用女權與影響女權思想的傳播（喬以鋼、劉堃，2008）。基於須藤瑞代（2005）主張 1900 年前後梁啟超婦女論述是「女性論」，而非女權論，此部分以梁啟超婦女論述是「女權論」或「女性論」之矛盾為探討重心。

### （一）是女權論？

面對優劣局勢，1903 年梁啟超通過《新民叢報》呼籲改革「吾國民義務思想之薄弱」，培養「公德」，塑造「新民」，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之迫切需要，實因我國國民普遍缺乏國民主體意識，希望國民覺醒以爭取自由和民權（孫宏雲，2012）。梁啟超由關心國族出發而關懷婦女的處境與問題，召喚的新國民是獨立自主個體。學者分析當男性知識分子追求振興國族時，歐美理論與情形被奉為國家現代化之圭臬，方興未艾的女權運動被男性視為現代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人權」、「民權」與「女權」被劃上等號（劉靜爽，2008）。宋少鵬（2010: 92）提出「中國女權運動是現代國民國家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國民——國家的結構使女性得以擺脫家——國結構下個人對家族的依附而成為獨立的個人」。五四時期梁啟超的女權觀已論及「自動」，即女性的主體自覺與自我努力，以及「有階段」來求取男女平權與涵蓋不同層面的女性權利，甚至呼籲和世界女性一起努力與就業競爭力。大體而論，此時梁啟超改變「男主外，女主內」女性論述，不再強調宜家宜室的女教，女權主張轉變為女性爭取就學、參與政治、婚姻與就業平等權益，不再依附國家建造的政治考量，益加突顯女性主體覺醒與自動之重要性。

## （二）是女性論？

面臨西方文化衝擊，清末知識分子深信體弱多病又無知婦女，是導致民族一蹶不振與阻礙國家進步之主因。著眼於實用觀點，知識分子積極形塑貢獻國家婦女的形象，但清末女權論述與斯賓塞、穆勒的學說有差異，因後者是在既有的國家體制下討論女權，沒有建立國家或新體制的需要。如宋少鵬（2010: 92）分析：「『天賦人權』在清末的女權論述中不是西方式的『權利平等』，而是『責任平等』」，早期女權論者或思想是立基於「責任平等」論證「男女平等」或女權正當性。如此可知，男性知識份子呼籲重視婦女與提升其地位，寄望女同胞承擔國家責任以獲得國民主體身分。對於女權藍圖局限於國族富強的背景與心態，喬以鋼、劉堃（2008: 41）評論：

這顯然是一個特定歷史情境的產物，它不單反映國際競爭形勢在當時給中國造成的極大壓力，同時也揭示了「國權」逾越「父權」而直接對女性進行詢喚與徵召的歷史進程。

宋少鵬（2010: 88）也認為：「清末所有的女權論述都是在民族國家的關係框架中談論女權，女權與國家保持著聯動」，或者「女權，是作為民權的一部分，被男性維新人士所重視，也因為女權對於國權的作用，被收納進服務於鞏固國權之急迫事業」（同上，2015: 42）。孫宏雲（2012: 187）闡釋國家對梁啟超的重要性：

綜觀梁啟超流亡到日本後到辛亥革命的思想歷程，可見在其國家思想論一以貫之，始終以建立近代民族國民國家乃至將來發展為民族帝國主義民族作為理想目標。

在此心態下，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並不關心當下女性的權利」，真正關注「建構理想未來女性」（宋少鵬，2010: 87）。李國彤（2008）評論梁啟超 1903 年遊歷美國歸途，其借女性地位對照中國與西方文明的差距，然仿效意味濃厚，缺乏倡議與實施男女平權之真意。換言之，梁啟超重視婦女的「女性論」，實因國家強弱與女性強弱成正比，更重要的是身心優良婦女與資源是挽頹拯溺之關鍵。

梁啟超批評輕忽婦女之積習，引導正視婦女身體、教育和資源的革新風氣，此中也逐漸出現婦女的自覺。一方面，雖立論於天賦人權或民權，晚清女性論

述、女權思想引介或女權攸關文章翻譯，難以脫離國家富強範疇。另一方面，依附於國家建造論述，「新女性藍圖就是女性向男性模式靠攏」（丁琪，2011: 156）。晚清改革聲浪中，女性看似可以脫離父權桎梏，成為獨立個人。如梁啟超妻子李惠仙、康有為長女康同薇等女性參與《女學報》刊行，藉此聲討禮教傳統對婦女迫害。然審視這些婦女的覺醒多源自於家中知識男性的啟發及鼓勵，是追隨者的角色，縱使展現某種程度的自主，難以論斷這些先覺女性展現的是真正的女權。

近代婦女問題與女權運動在仿效西方與救國保種雙重考量中展開，維新派或革命派的「『女權』觀並未考慮單獨的性別權利問題，而是移用『民權』作為女權的同樣准的」（柯惠鈴，2002: 68-69）。宋少鵬（2015: 42）表示確立「女權」的正當性，「只能通過主動加入到推翻舊式的家——國國家結構、建立新的現代國民國家的行動中來，才有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說，梁啟超婦女論述不僅反映當時男性知識分子對於現代化的認同與挽頹拯溺的心跡，也是為邁向現代化新中國的「性別化想像」（劉人鵬，2000: 125）。梁啟超婦女論述存在著是「女權論」或是「女性論」的矛盾性質，停留在國家／民族雙重前題下，模糊女性主體的經驗、行動與定位，顯露民元後婦女進入公領域與爭取更多女權之艱辛歷程，如參政權（李細珠，2005）、財產繼承權（梁惠錦，1999）等。

## 二、婦女應是「西婦」或「賢妻良母」？

母可否認，受西方思潮與女權思想之影響，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引用西方女性的情形或女權理論，以彰顯國內急待改變婦女與其問題。以梁啟超為例，倡議以歐美為師，效法西方革新精神與實際經驗，希望通過婦女的改變與力量救國。他更以國內婦女與西方女性進行對比，對照中西國家國富民強的差異處。反觀 1910 年代的《婦女雜誌》，依舊出現「母教」、「母範」標題的文章（宋少鵬，2012），反映知識分子理想的女性是強國保種的賢妻良母，無法逾越女性的傳統與附屬家庭地位之框限。由此觀之，梁啟超主張的婦女是「西婦」或「賢妻良母」，值得審慎思考。

### （一）是西婦？

1897 年梁啟超在主筆《時務報》撰寫〈記江西康女士〉，文中首次提出對女子教育的觀點（劉靜爽，2008）。文章起頭，梁啟超（1978g: 119）寫道：「中國女學之廢久矣。」文中他卻極力讚揚自美國學醫歸國的康愛德女士與美國女性「作比例，愧無地矣」，康女士成為西方教育與現代公民的代表。梁啟超（同上：

120) 更以康女士對照古代才女，她是「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新式中國婦女之楷模，國族前途之希望（胡纓，2001）。此外，梁啟超撰寫或翻譯的〈佳人奇遇〉、〈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與〈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三篇小說，其中西洋女性被讚譽為社會貢獻而忘我之典範。例如，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逃往日本期間，1902年梁啟超（1999c: 863）發表〈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文中記敘「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高度讚揚羅蘭夫人不亞於男性的政治才能與獻身革命。梁啟超賦予二萬萬國內婦女目標，要學習西國女子「立身端正，心地光明，有獨立之精神，無依賴之性質，為國捨身，為民流血，其遺跡見於歷史者」（沈時華，1915: 8）。梁啟超論點明白標誌在知識分子心中，與貢獻國家、改造社會的西方女性相比，國內二萬萬女子是「聯結苦痛、落後、弱、貧、女、惡、尺、殘廢、有礙生產與生殖的符號」（劉人鵬，2000），無疑是亟待改造的落後象徵。

梁啟超以觀察美國經驗，提出以婦女地位衡量國家文明程度。1903年遊歷美國歸途中，梁啟超（1999d: 1198）的一段話呈現重視婦女箇中原委：

西人有恆言曰：欲驗一國文野程度，當以其婦人之地位為尺量，然也？否耶？凡遊美者皆謂美國之風，女尊男卑，即美國人亦自謂然。以余觀之，其實際斷非爾爾，不待辯也。

他也枚舉西方國家或日本婦女的地位，對照出國內婦女知識淺薄、無生產力與地位低下的情形（許慧琦，1997）。在《新民說》論說生利分利，梁啟超（1999c: 698）細論「婦女之一大半」就是十三類分利者之一。相對於「西國之學校、教師、商店會計，用婦女者強半」，能夠「發揮而利用之，則其於人羣生計，增益實鉅」。不從事室內外生利事業的國內婦女，「則分利者十六七」（同上）。不僅如此，由〈論女學〉、〈倡設女學堂〉或是之後〈人權與女權〉等文章，亦可明白梁啟超心目中有貢獻的婦女風貌（鄭永福、呂美頤，2005）。民初，梁啟超也參酌歐美婦女為典範，主張以西式教育、公共生活等為婦女解放標準（胡纓，2001）。

胡適追憶梁啟超說：「《新民說》篇篇指責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雷平、周榮，2019: 3）。據分析，梁啟超自美歸國後政治思想起了轉變，同時對美國考察產生失望（鄭杰，2003）。有趣的是，梁啟超（1999d: 1146）曾批評：「美國號稱最尊女權，然亦表面上一

佳話耳」，即使觀察到與先前主張不同之情形，卻仍堅持：「雖然，謂美國婦人之地位，在萬國中比較的最高尚，則於信之」（同上：1198）。梁啟超在中西婦女對國家貢獻、地位與國家文明關係的見解，可謂是當時知識分子既想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卻又「臣服」這些國家「文明進步」且推崇「泰西」女子矛盾情結之例證（劉人鵬，2000）。〈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一經刊登後，隨後被多方轉載改寫，這些西方婦女被提升成為新女性的典範，也補足中國原有典範婦女的不足之處。彰顯的是，梁啟超與當時知識男性對西方女性與其能力的憧憬與寄望，西方女性令人欣羨的文明形象與裨益國家的能力，自是相距甚遠國內婦女之模範。同時，婦女的歧異也象徵落後到現代化的分野，以及成為追求國家文明進化的對策。

## （二）是賢妻良母？

另一方面，男性知識份子心目中理想女性是救國、生利，做母親、施母教之人，「女正家正」仍是女性責任。倡導女子教育時，梁啟超（1978b: 19）強調婦女要謹守「婦道」、「相夫」、「教子」、「宜家」、「善種」、強國保種的賢妻良母。他撰寫〈創設女學堂啟〉被視為「『賢妻良母主義』的宣言」（程郁，2005: 76），即使主張女性應受教育，目的卻不在培養女性進入社會或選擇職業之能力（張朋園，1994），依舊固守「男外女內」傳統。並非只有梁啟超重視婦女賢妻良母的功能與角色，晚清盛行「國民之母」論，最早提出此稱謂的金天翮倡議女性走出家庭和參與政治，卻還是承擔「誕育佳兒」的賢妻良母。換言之，縱有國民之母是否為「賢妻良母」之論爭，梁啟超、金天翮與其他男性是「站在男性主體立場上，眼中的理想女性是儒教下的賢妻良母」（丁琪，2011: 156）。民國建立後風氣所及，女子教育、留學與就業有所變革，「旨於塑造女性成為賢妻良母之教育觀念與內涵」，依然如故（李曉蓉，2012: 54）。

鄭永福、呂美頤（2005）強調清末民初「賢妻良母主義」，是迥異於三從四德舊婦女。如梁啟超主張女性要具備一定知識、能力和主動精神，需承擔社會義務，為強國善種做貢獻，要有相夫教子能力與家庭社會責任感。黃嫣梨（2004）批評梁啟超的婦女觀點是矛盾：一方面號召婦女自養、自立，一方面又要婦女回歸家庭賢妻良母角色與責任，負起胎教、母教與家庭勞務工作。劉慧英（2009: 6）則是關注婦女經濟，提出經濟地位係指「女性在整個國計民生中的位置」，而不是之後婦女就業、經濟收入對家庭以及她們在社會上地位的意義。女性即使可以受教育，兩性的責任和生活是截然二分之意涵，不言可喻。1920年代梁啟超思想有所改變，正式提出興女權，女子教育不再著重宜家宜室，而是培養

女性就業能力與機會，實現男女性教育、職業與政治平等。不容忽視的是，民初政府極力推行「賢妻良母主義」，五四運動形成反「賢妻良母主義」風潮（程郁，2005）。依據呂美頤（1995）與陳延媛（2005）的研究，分別論述「賢妻良母」的質變。如呂美頤（1995）主張，近代賢妻良母主義與封建賢妻良母概念是迥異的。據陳延媛（2005: 18）闡釋，梁啟超主張賢妻良母是「意味著受過教育並對國家有貢獻的新式婦女」，「並非中國傳統儒教經典的『舊婦女』，而是在近代東亞的時空條件之下創造出來的『新婦女』」，是對國家富強有貢獻的新婦女。五四時期胡適、羅家倫等人批評，賢妻良母為教育目標所培育的是傳統守舊婦女。更關鍵的是，以新婦女形象出現的賢妻良母，卻在數十年間變成舊式婦女。

梁啟超是維新分子中接受西化較深者，一方面倡議效法西方，推崇西方婦女為榜樣，倡議國內婦女的改造。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婦女改變與力量救國，卻又加重加深婦女傳統角色與責任（柯惠鈴，2002）。訴諸女性需有自覺，求知能力且男子立於同等地位，汪丹、汪兵（2004: 33）稱梁啟超的「新婦觀」，是推動「文化傳統『與時俱進』的本土化婦女觀」。縱使汪丹等人評述梁啟超的婦女觀是「新婦觀」，仍脫離不了塑造合乎妻母女德的範疇。思想變革，婦女在私／公領域、家庭／國家的不同定義以及角色、貢獻中游移，職是，從梁啟超的女性論述觀之，存在著「西婦」或「賢妻良母」之矛盾處。

### 三、男性是女權「提倡者」或「壓迫者」？

眾多研究者指出男性知識份子近代女權「提倡者」、「先聲」或「捍衛者」，為女權思想萌芽與婦女變革提供合宜的環境（如肖莉丹，2013；李國彤，2008；李曉蓉，2012；許慧琦，1997；劉人鵬，1999；劉靜爽，2008）。另一方面，出於強國保種的私心或難以逾越性別禮教，如梁啟超也流露出輕視女性與維護父權體制的「壓迫者」的心態，矛盾性質可見一斑。

#### （一）是提倡者？

清末男性知識分子倡言關注婦女問題，烘托出婦女思想革故鼎新氣象。進而言之，女權的啟蒙與倡導是由男性提倡與主導，因他們引介西方思想，倡議婦女地位、權利與給予支持（肖莉丹，2013；李國彤，2008；李曉蓉，2012；許慧琦，1997；劉人鵬，1999）。如金天翮（2003：小引）在《女界鐘》描述男子「已有所耳聞並覺悟」或者「摩娑自由之術，灌溉文明之花」，但是「可嘆中國女子卻充耳不聞、聞而不醒」，強調知識男性承擔沉睡不醒女性拯救者之責（宋

少鵬，2015；尚莉丹，2013）。眼見婦女地位低下，梁啟超（1978a: 39）主張婦女要學習「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的實學。求取經濟獨立，要改變傳統婦女的無智無識，他在〈論女學〉言簡意賅指出：「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同上：41），以根除國族之沉痾，達到國富民強之功利目的。當時婦女生活能力與活動空間受限，男性控制社會的資源和權力，極少數覺醒的婦女也是受到家中知識男性的啟發或影響，借助男性提供資源。前曾言及，《女學報》的刊行從創辦人李閏（譚嗣同妻子）與黃瑾娛（康廣仁妻子），主編到主筆如康同薇（康有為長女）、李蕙仙（梁啟超妻子）與裘毓芳（裘廷梁姪女），即是例證。

## （二）是壓迫者？

男性知識分子呼籲重視婦女與其權利成為時代焦點，卻也衍生「女性主體性被置換的男性主導特徵」（丁琪，2011: 156）。審視所謂「中國男性女權先聲」論見（劉人鵬，2000），論者認為反映出男性想透過婦女改造，消弭列強衝擊下產生自卑和建構現代新男性（王政，2000；尚莉丹，2013；劉靜爽，2008），同時流露歧視婦女、維護父權地位、拯救者優越感等「壓迫者」的守舊心態及言論，分述如下。

首先，劉人鵬（2000）評論近代中國女權觀，是夾雜男性慾望的「雜種女權說」，因為男性知識分子為婦女發出不平之鳴，不是為女性權益，而是相信婦女是一種無能譬喻與敗因所在。梁啟超（1978c: 120）將國內婦女情形歸咎於男性歧視：

男子之強悍者相率而倡扶陽抑陰之說。盡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類相待，是故塵塵五洲，莽莽萬古，賢哲如鯽，政教如海，無一言一事為女子計，其待女子也。

梁啟超（1978a: 39）直指：「男子貴，而婦人賤，婦人逸，而男子勞」，更明白譬喻婦女是「惰為游民，頑若土番」。而且「夫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以民為奴隸，為妾婦，為機器，為竊賊而可成國者」（1978h: 34），在其心中「逸而賤」婦女，與游民、土番、奴隸、竊賊並無二致。如在《女界鐘》小引，金天翮（2003）寫道：「中國男子已有所耳聞並覺悟，可嘆中國女子卻充耳不聞、聞而不醒。」梁啟超或其他男性的女性論述參雜男性主導的性別立場（黃嫣梨，2004；劉慧英，2009），怪罪女性不願聽聞或覺醒，未能擺脫輕視或貶抑婦女的守舊觀念及心態。



其次，追求現代化新格局中，需要兩性共建中華民族「新民德」為前提，國內婦女無覺不醒、女權不昌妨礙男子的改革與成就（汪丹、汪兵，2004）。細究男性知識分子急於引用西方文明或制度之初衷，也非著眼於改變社會既有的兩性關係。男性知識分子倡導女性問題、國民身分與國家責任，缺乏對於壓制女性強者（即男性）與父權體制的質疑與批判（宋少鵬，2015）。簡言之，男性透過婦女主張捍衛父權主體的私心（肖莉丹，2013）。在重視婦女表象的背後，企圖將國不富、民不強歸咎婦女，如此無法擺脫揚男抑女情懷，也未強調革新父權價值與社會體制，深信女權與國男性們維護的是自己主體地位。

再者，「西方——中國」之外，劉人鵬（2000）主張近代中國女性論述突顯「男——女」、「強——弱」的權力結構。自生利觀點，劉慧英（2009: 8）也表述男性是「權力者」：

中國現代化初期，男性權力者將婦女描述為一種類似殖民者確立受殖民者「懶惰成性」的被動者——「待養」、「待食」、「坐以待斃」，從而將她們或她們之中某些人所具有的一切積極的主動性都取消或抹煞掉，並使她們處於一種永久而又嶄新的附屬於男性的關係中。

歸罪婦女身心限制與不參與經濟生產，邁向現代化進程中掌握新知識權威與優勢地位依舊是男性。隱含在倡導女權呼聲中，男性是女性「拯救者」，同時體現男性主流思想對女性的主宰與優越感（丁琪，2011；喬以鋼、劉堃，2008）。一言以蔽之，如此的性別關係「再構了男性對於女性的性別優勢」（宋少鵬，2015: 47）。

分析百年來中國女權思潮，王政（2000）與其他學者（劉靜爽，2008）提出國內女權主義的萌芽與原動力，源自於男性／男權遭逢帝國主義衝擊產生的自卑感。在意識層面，女同胞的改進為帝國主義衝擊下風雨飄搖的國族，也為男性自卑感，找到最體面的藉口及解決方式（肖莉丹，2013）。男性透過「對文明／女權的譯介和傳播，擁有對新知識和新世界的特權，也就擁有了擔當女性拯救者和新世界導師的責任」（宋少鵬，2015: 47）。女性化身國民之母，既是拯救國族的行動主體，又是受父權壓迫的客體（劉人鵬，1999）。職是，「男性是女人壓迫源頭，也是女權的提倡者」（李曉蓉，2012: 52）。此外，本文主張男性是女權提倡者亦是壓迫者的矛盾立場，呼應衣若蘭（2003: 331）解讀國族與女權論述是「時而相容，時而對立，時而又從屬」的關係。相容是為國家要現代

化，婦女要改造參與救國，相信兩者必須齊步向前，男性提倡與借助女權；對立乃因男性自覺或不自覺抱持性別傳統倫理，當女性爭取參政等權力時，男性又轉變排斥立場，成為女權壓迫者；從屬是面對國族改造至高目標，並非著眼於追求男女平等，縱使獲得男性主體倡導的權利，婦女與女權區居工具與手段的從屬地位。我們不難瞭解晚清民初男性知識分子用不同的理解方式與話語，界定與倡導婦女權益或不盡相同，其間仍有共通的女權議題與貢獻，如梁啟超主張男女平權、女子教育、戒纏足、生利強國。另一方面，這些性別論述體現以男性為主體的女權思想與進程，參雜男性個人對國家、婦女形塑以及女權的想像，主導還是男／父權意識與權益，也足見男性倡導女權的矛盾性質。

## 伍、結語

近代中國女權思潮產生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文化條件，不同於西方女權思想或運動的興起。晚清倡議拯救列強侵略國家的知識分子掀起改革運動，伴隨憂患意識與使命感下，知識分子們有介紹、從事西書譯介，有遊歷西方，或與西方人士有所接觸，得到片段或者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識，知識分子中真正遊歷歐美國家而提出變法觀念者，人數極少。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難免流於「龐雜，難以定一」（李鴻禧，1986: 142）。梁啟超所提的天賦人權概念雖較為簡單，卻也揭示人權的基本性質、應有性與重要性。主張人權是男女性都應有權利，同時顯示梁啟超自我意識的覺悟（向仁富，2005）。就國族與性別論述而言，論者強調梁啟超提出新的時代命題：在西方文化大潮沖擊下，男性如何與向來被輕視的婦女一同面對三千年未有大變局（汪丹、汪兵，2004）。關注婦女議題，進而主張婦女要受教育、重視身體與提升經濟生產，是「從推動社會意識的改革到個人生活層面上」，因而梁啟超可貴之處是「不僅理論上予以闡釋，而且實踐中努力踐履」（黃嫣梨，2004: 89）。此外，在 1922 年演講中，梁啟超闡述女性自我覺醒，以及讓女性階段性達成解放自己，發展生理特長與選擇職業，迥異於之前男性做為女權主導者的義涵，女性自我意識與主體性的意味更加濃厚。Duara (1991: 68) 分析西方知識份子對現代化的論述，他們藉用某些固有文化中的符號、概念和習俗建構出「傳統」(tradition)，如此的傳統是「再構的」(reconstructed)、是「認識論延伸的」(epistemologically derivative) 意象 (image)。重要的是，這些再構的傳統在現代化論述中可以被某種目的所用，卻也反映了

知識分子的「文化困境」(cultural dilemmas)。呼應 Duara 的觀點，本文藉由剖析梁啟超的觀點與論述，主張其婦女與女權思想之矛盾處，矛盾處也呈現出現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的文化困境。

綜上所論，清末興女學、廢纏足、倡女權至五四時期婦女解放，婦女被男性知識分子定位於國家邁向現代化亟待解決問題。李國彤（2008: 23）說：「維新派代表人物對婦女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言辭激緩有差，但都彰顯出民族主義的思想主題」，因「國家主義壓倒了一切，包括性別和族群」。無論視婦女為「國民之母」、「天賦人權」、「男女平權」、「女國民」迥異觀點，或是交錯呈現出的女權論述，皆與國家建造息息相關。誠如劉慧英（2009: 2）評論〈論女學〉是：

當時的梁啟超是將〈論女學〉——改變中國婦女的落後狀態，提出婦女問題作為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一部分。〈論女學〉是女權啟蒙初期一篇討論婦女問題的檄文，他吹響了解決婦女問題的「號角」，從此婦女作為一個曠日持久的問題一直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相伴相生。

對梁啟超而言，倡議天賦男女平權，關懷以及改造婦女受壓迫地位與被貶抑價值，考量的是強國保種（丁琪，2011；史莉琴，2011；宋少鵬，2015；李又寧，1981；李曉蓉，2012；許慧琦，1997），他的觀點清楚反映革新男性看待婦女是象徵民族敗落與國家衰亡的心態。學者強調這些男性為主體的女權觀，自然難以擺脫男尊女卑思想，重視婦女是為國家主權的價值與民族血脈的利益，也是為了讓男性享受更多自由與更好生活（肖莉丹，2013）。重視婦女與男女平權的論述是建構「現代男性主體」的一部分，也成為男性區分自己與以往男性不同的標誌（劉靜爽，2008: 10）。援引卻迥異於天賦男女平權的西方女權，梁啟超與其他男性雖然倡導「國民之母」或「新女性」與女權，建構現代新國民的真正用意顯然超越婦女權益，女權終究淪為國家建造的權謀工具與附庸角色。就此而言，本文主張梁啟超婦女論述存在著是「女權論」或「女性論」矛盾之處。

其次，梁啟超（1978g: 119）一方面貶低「能為花草風月之言」或「稍讀古書，能著述」之古代才女，一方面號召二萬萬婦女向獻身革命的西方婦女與留美歸國的康愛德女士學習。以國家積弱為恥請命救國之論，積極樹立以西方婦女為模範的新女性形象。知識男性們的主張與期盼立基於否定傳統婦女，追求生活方式、性別關係上能與「泰西」一樣平等，如此一來，愈加彰顯男性／父

權在帝國主義衝擊下產生的自卑心態與情結（王政、劉禾、高彥頤，2005；劉靜爽，2008）。梁啟超是實用理性的救國取向（韓廉，2002），強調必須改革婦女的依賴無識，女性要受教育，注重身體健康，能生育教育強健下一代，成為相夫教子、宜家宜室的賢妻良母。國家現代化走向中，日本學者須藤瑞代（2005）分析清末女權論述立基於西方「男外女內」傳統性別分工（宋少鵬，2010），梁啟超主張國內婦女成為「新婦女」，是對國家強盛有貢獻的賢妻良母（陳延媛 2005: 18）。女性既要效法獻身革命、獨立自養「西婦」的榜樣，也應回歸家庭負擔母教與家務料理「賢妻良母」的角色與能力，這也是梁啟超婦女論述中矛盾與受質疑之處。

再者，男性關懷婦女為其發聲，成為女權的提倡者，可謂之近代女權發展特色之一（李曉蓉，2012）。知識男性承擔婦女拯救者的角色，為先進女性提供轉變兩性關係契機，然劉慧英（2009: 8）如此闡釋「男性女權先聲」：

「生利者」男性成為主動者、勤勞者和民族國家的拯救者以及財富的創造者，而「分利者」婦女則是被動者——只消費不生產的被養育者，從而對應於民族國家的先進／落後、新／舊、強／弱，在性別關係上則建構起同樣的二元對立，並就此確立起男性權威在民族國家中處於強盛、領導地位的合法性。

男性是「主動者」、「勤勞者」、「拯救者」與「創造者」，對廣大婦女在家庭或生產性勞動的價值與意義，是貶抑或視而不見（同上）。前曾言及，男性倡導女權，卻因性別優勢地位與優越感，充斥著男性是女性捍衛者的言論或思想，也流露輕視婦女，以及維護父權地位、拯救者優越感的「壓迫者」心態。張朋園（1994: 53）認為：「女子身心的解放，實為梁氏早年推動維新運動中十分突出的論點。」分析梁啟超的女性論述，其中或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性別問題，或是參雜揚男抑女、難以擺脫貶低甚至否定女性的立場（黃嫣梨，2004）。縱使 1922 年梁啟超正式提出興女權，婦女觀念有所改變，但是通過男性的建構，女性主體性與權利依舊隱晦不明。職是，梁啟超女權思想被批評「並非是一條真正的、徹底的『婦女解放』之路，而是一條在菁英男性主導下的『婦女解放』之路（鄭永福、李道永，2011: 155）。易言之，梁啟超的女權論述反映出處於新舊交替之際男性知識分子是女性或女權的提倡者，也是壓迫者的矛盾性質。

對梁啟超而言，婦女不僅是性別，是一種國族強弱的隱喻，更是傳達自己思想的媒介。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呼籲重視婦女與女權的思求變革，展現近代中國由男性定義性別論述的特性、進程以及其問題性。除了上述，本文提出梁啟超性別論述與其矛盾處之中，有數個值得注意的特性。其一，國家建造脈絡中婦女主體的「依附性」：揭竿改革呼聲中，婦女與其權利必須依附或貢獻國家建造，才有受重視或存在的價值。顯見婦女淪為改革客體或富強工具，並非行動主體，尤其是婦女群眾缺乏性別意識與主體覺醒。其二，國族問題因婦女「簡單化」與「正當化」：深信改革婦女，國族衰敗即可迎刃而解，知識份子不經意流露將國族問題「簡單化」心態。藉由男性視野，通過對女性無識無用的批判與諉過，國家貧弱也被「正當化」。其三、女權觀念的「融入性」，擘劃出女權價值與空間：西方女性／權衝擊男性的性別觀念，梁啟超倡議西婦的形象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國內婦女無知無貢獻，融入西婦典範為婦女預備走出家庭，甚至參與社會革命的空間。在此前提，男性主導婦女某些程度的自主與進入公領域之權利，梁啟超是這類知識男性的代表。其四，性別論述的「衝突性」：男性價值與經驗主導的性別論述，在公／私領域重新界定和不斷推移。如梁啟超定位婦女成為走入社會革命的西婦與擔負家庭的賢妻良母之雙重角色，如此角色顯示男性緊握婦女又回歸家庭傳統的私心與衝突性。其五，性別平等不敵男性的性別優勢：呼籲婦女覺醒主動爭取權利，卻不乏以既有的倫理或政治勢力以群體利益為名，行箝制女性各項權利和自主之實，而被箝制女性們難以起而質疑與捍衛自己權利／力的正當性。因而當先覺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或採取更激進方式，嘗試讓女權脫離國族範圍，突顯女性主體意識覺醒與行動，女權卻隨著政治勢力消長，在在說明女權論述臣服於男性性別優勢與父權價值的情形。

本文檢視梁啟超的婦女與女權論述，嘗試指出其中矛盾之處。婦女與女權論述不僅是梁啟超思想被廣為討論的理念，並且具有釐清近代男性知識分子性別論述與省思性別論述發展進程之雙重意義。母可否認，梁啟超關懷婦女或女權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近代婦女的解放，然處於思潮與歷史轉換環境以及囿於個人局限，其論點免不了呈現新舊並存、中西雜樣的面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以及對女性的認識與期許缺乏真正性別「平等」意識等特性。也如上分析，梁啟超婦女與女權論述呈現出矛盾之處。關於梁啟超的婦女觀，據黃嫣梨（2004: 90）分析，就梁啟超豐富多產著作而言，攸關婦女的文章不過十數篇，對照之下，「難免讓人懷疑梁氏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和深入程度」。吳廷嘉

（1988）則是評論梁啟超的婦女論述，是「雷聲大，雨點少」。Levenson（1959）也評述梁啟超的思想，是不斷改變外在觀念來適應內在需要。梁啟超見到西方價值，理智上疏遠文化傳統，然而受到歷史制約，感情上仍與中國傳統相繫，或許因此，他似乎迴避某些問題。例如，梁啟超抨擊「未嫁累其父，既嫁累其夫，夫死累其子」的婦女是國家積弱根源之時，並未見他回頭審視為父、為夫、為子的父權制度與儒家思想如何約束或主宰，甚至是壓迫婦女，其論述也較難尋到觸及女性意識與主體性的討論。以晚清至五四女權的觀點，文中所謂矛盾處（如女權與賢妻良母）或可相容或並行不悖。重要的是，梁啟超將婦女議題放置到國家公領域，引發社會關注這些「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棄置』的婦女群體」，即使「在這些男性思想佳的啟蒙話語中成為需要拯救的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並開始被授予自立和自強之權」（劉慧英，2009: 2）。簡而言之，梁啟超的婦女論述是在中國傳統思維模式下求新求變的努力，對近代婦女觀念的啟蒙與解放，他的影響是廣泛深遠。因而，對梁啟超婦女或女權主張的矛盾處，藉用黃嫣梨（2004: 90）的評論，不應「過於苛求」。

## 謝誌

由衷感謝匿名審稿委員們，對本文提出寶貴的意見與建議。此外，感謝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計畫」(MOST 105-2811-H-366-001)。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書目

- 丁琪（2011）。〈中國近代以來民族與國家建構與婦女解放的互動〉，《山東社會科學》，186, 2: 155-159。
- 王政（2000）。《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王政、劉禾、高彥頤（2005）。〈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代序）〉，收入王政、陳雁（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頁 1-2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史莉琴（2011）。〈梁啟超女權思想述略〉，《經濟研究導刊》，7: 271-272。
- 向仁富（2005）。〈梁啟超女權思想析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5: 335-340。
- 衣若蘭（2003）。〈無聲亦有聲：評介呂芳上等編《無聲之聲：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社會、文化）（1600-195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 317-332。
- 余英時（1991）。《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
- 吳廷嘉（1988）。《戊戌思潮縱橫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呂美頤（1995）。〈評中國近代關於賢妻良母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5: 73-79。
- 宋少鵬（2010）。〈中國女權思想真的被西方理論綁架了嗎？〉，《讀書》，5: 86-95。
- （2012）。〈清末民初「女性」觀念的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5: 102-116。
- （2015）。〈馬君武「女權」譯介中的遮蔽與轉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5: 37-48。
- 李又寧（1980）。《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臺北：聯經。
- （1981）。〈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頁 179-24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李國彤（1995）。〈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放思想綜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 143-161。
- （2008）。〈從跨文化視角反思戊戌時期的婦女啟蒙〉，《江海學刊》，3: 19-25。

- 李細珠（2005）。〈性別衝突與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參政權案為例〉，《歷史研究》，4: 69-83。
- 李曉蓉（2012）。〈中國近代女權特色之分析（晚清至五四）〉，《高雄師大學報（教育與社會科學類）》，33: 43-59。
- 李鴻禧（1986）。〈迂迴邁向推展民主憲政的道路：陶百川的志業與生涯〉，《中國論壇》，265: 139-147。
- 杜維明（1989）。《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臺北：聯經。
- 汪丹、汪兵（2004）。〈是「新婦」還是「西婦」？：梁啟超新婦的文化評論〉，《思想戰線》，30, 1: 32-37。
- 沈時華（1915）。〈忠告女同胞〉，《婦女雜誌》，1, 12: 8。
- 肖莉丹（2013）。〈論中國近代女權崛起中的男性邏輯〉，《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7: 111-113。
- 周昌龍（1995）。《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臺北：時報文化。
- 金天翮（2003）。《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
- 柯惠鈴（2002）。《婦女的「國民革命」：國家統一與社會互涉的解放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適（1922）。〈女子問題（二）〉，《婦女雜誌》，8, 5: 6-9。
- （1986a）。〈《鏡花緣》的引論〉，收入《胡適文存：西遊記考證》第2集第4卷，頁85-118。臺北：遠流。
- （1986b）。〈祝賀女青年會〉，收入《胡適文存：三百年中的女作家》第3集第7、8、9卷，頁239-241。臺北：遠流。
- （1986c）。〈慈幼問題〉，收入《胡適文存：三百年中的女作家》第3集第7、8、9卷，頁243-248。臺北：遠流。
- （1986d）。〈藏暉堂笥記卷二〉，收入《胡適留學日記（一）》，頁81-124。臺北：遠流。
- 胡纓（2001）。〈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9: 1-29。
- 夏曉虹（1995）。《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市：作家。
- 孫宏雲（2012）。〈清季梁啟超的國家論及其相關理論背景〉，《澳門理工學報》，15, 4: 177-189。
- 張朋園（1994）。〈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分子的約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 51-64。



- 梁啟超 (1978a)。〈變法通議：論女學〉，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1 冊，頁 37-44。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b)。〈倡設女學堂啟〉，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2 冊，頁 19-20。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c)。〈戒纏足會敘〉，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1 冊，頁 120-122。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d)。〈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3 冊，頁 12-22。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e)。〈人權與女權〉，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14 冊，頁 81-86。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f)。〈我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意的幾種學科〉，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13 冊，頁 3-7。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g)。〈記江西康女士〉，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1 冊，頁 119-120。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78h)。〈中國積弱溯源論〉，收入《飲冰室文集》第 2 冊，頁 12-42。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1999a)。〈新民說：論進步〉，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第 3 卷，頁 683-689。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
- (1999b)。〈新民說：論權利思想〉，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第 3 卷，頁 671-675。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
- (1999c)。〈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第 3 卷，頁 858-864。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
- (1999d)。〈新大陸遊記節錄〉，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第 4 卷，頁 1125-1128。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
- (1999e)。〈新民說：論生利分利〉，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第 3 卷，頁 695-702。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
- 梁惠錦 (1999)。〈婦女爭取財產繼承權的經過〉，收入《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61-278。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 許慧琦 (1997)。〈梁啟超與胡適的女性論述及其比較初探〉，《清華學報》，27, 4: 423-458。
- 陳延媛 (2005)。《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  
臺北：稻香。

- 喬以鋼、劉堃（2008）。〈「女國民」的興起：近代中國女性主體身分與文學實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40-47。
- 游美惠（2000）。〈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8: 5-42。
- 程郁（2005）。〈二十世紀初中國提倡女子就業思潮與賢妻良母主義的形成〉，《史林》，6: 66-78。
- 須藤瑞代（2005）。〈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2, 1: 137-142。
- 黃嫣梨（2004）。〈梁啟超與近代婦女解放〉，《文哲史》，3: 88-90。
- 楊貞德（2004）。〈自由與限制-梁啟超思想中的個人、禮與法〉，《臺大歷史學報》，34: 43-85。
- 雷平、周榮（2019）。〈“繁華落盡未成空”：梁啟超逝世後之時評〉，《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 2: 1-6。
- 劉人鵬（1999）。〈「中國的」女權、翻譯的慾望與馬君武女權說譯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 1-42。
- （2000）。《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劉慧英（2009）。〈「生利說」的來源及衍生於婦女問題〉，《開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 1-8。
- 劉靜爽（2008）。〈晚清兩性女學觀比較：以梁啟超、薛少徽為例〉，《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3: 9-12。
- 潘毅（1997）。〈主體的呼喚與失落：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收入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合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的探索》，頁245-266。臺北：稻香。
- 鄭永福、呂美頤（2005）。〈關於近代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山西師大學報》，32, 4: 58-63。
- 鄭永福、李道永（2011）。〈梁啟超的婦女解放思想〉，《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 1: 152-155、175。
- 鄭杰（2003）。〈1903年前後梁啟超政治思想轉變原因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 134-139。
- 鮑家麟（1981）。〈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頁242-27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99)。〈民初的婦女思想（一九一一～一九二三）〉，收入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頁 305-336。臺北：稻香。
- 韓廉（2002）。〈戊戌時期婦女運動側重民族革命的文化分析〉，《清史研究》，1: 41-47。
- 嚴復（1898）。〈論滬上創興女學堂事〉。國聞報，1898 年 1 月 10 日、11 日。

## 二、中文譯著

- Skinner, Quentin（斯金納）（2002）。《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西瑞森業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三、英文書目

- Duara, Prasenjit (1991).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1: 67-83.
- Hesse-biber, Sharlene N. and Patricia Leavy (2006). *The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Huang, Philip C. (1972). Liang Ch'i-ch'ao: The idea of the new citizen and the influence of Meiji Japan. In Buxbaum, David C. (Ed.),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pp. 36-67). Hong Kong: Cathay Press.
- Ko, Dorothy (2001).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venson, Joseph R. (1959).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bson, Colin (2002). *Real World Research: A Resource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d Practitioners*. Oxford: Blackwell.
- Wang, Zheng (1999).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四、電子資料

游輝榮（2005）。〈中外學者如何看待梁啟超〉。網址：  
<http://china-studies.taipei/comm2/atyohRpps.doc>。點閱日期：2018年12月23日。

# **Modern Male Intellectuals' Gender Discourse and Their Oxymorons: A Case of Liang Qichao's Ideas about Women and Women's Right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May Fourth Era**

Hsiao-Jung Li<sup>1</sup> Wen-Shu Huang<sup>2</sup>

##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n women and women's rights that male intellectuals advocated is seen as a significant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In contrast to much research focusing on Liang Qichao as a political, cultural and thinking pioneer who voiced his concerns on women's issues such as anti-footbinding and girls' education, what is less researched is the oxymorons of his ideas about women. Therefore, by using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oxymorons of Liang Qichao's discourse on women and women's rights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s, alterations and influence of his ideas. Three oxymorons of Liang Qichao's discourse that the women's discourse was the ism of women's rights or womanism, that women should become western-style women or good-wife-and-virtuous-mothers and that male intellectuals were advocates or oppressors of women's rights have been suggested. Additionally, the research hopes to contribute toward the literature on gender studies.

**Keywords: gender / women's discourse, Liang Qichao, male intellectual, women's rights**

---

<sup>1</sup>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up>2</sup>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hu-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ao-Jung Li; E-mail: hjevieli@yahoo.com.tw

Received: 2020/09/01; Accepted: 2021/06/29

